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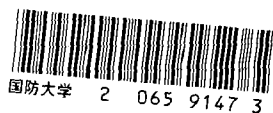


林青山 王 为 雷永生

李浙生 邱守娟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01246

6069134 20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林青山 王 为 雷永生

李浙生 邱守娟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石家庄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林青山 王 为 雷永生

李浙生 邱守娟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9 印张 220,000字 印数：1—7,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086·103 定价：0.88 元

前 言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所培育出来的理论珍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研究和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对于毛泽东的早期哲学思想，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方面的坚持、运用和发展，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本书分析了毛泽东的早期哲学思想，概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着重分析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我们献上这本小书，表达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的崇敬。

本书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组织编写。各章的执笔人是：

第一章：林青山；第二章：李浙生；第三章：雷永生；第四章：邱守娟；第五章：王为。

全书由林青山和王为统稿。另外，马仲良参加了第三章的部分工作。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参阅了近年来公开发表的和未公开发表的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许多研究成果，并注意吸取了其中某些有价值的内容，在此一并致谢。

我们的水平很低，成文又很仓促，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作 者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篇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形成.....	(1)
一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	(2)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52)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结构和历史地位	(68)
第二篇 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82)
一 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过程	(82)
二 毛泽东对矛盾学说的发展	(89)
三 矛盾运动引起事物的量变和质变	(112)
四 矛盾运动引起事物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	(116)
五 毛泽东对辩证法范畴的发展	(119)
第三篇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127)
一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发展过程	(127)
二 毛泽东论认识主体	(134)
三 毛泽东论认识客体	(142)
四 毛泽东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149)
第四篇 毛泽东对历史唯物论的发展	(171)
一 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的发展过程	(171)
二 毛泽东论社会基本矛盾	(176)
三 毛泽东论工农武装割据	(189)
四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200)
五 毛泽东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210)
第五篇 毛泽东对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一致性	

思想的发展	(220)
一 毛泽东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一致性	(221)
二 毛泽东论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	(236)
三 毛泽东论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	(260)

第一篇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和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和他的战友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运动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我们党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所制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都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指导而提出来的。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毛泽东哲学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深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实质，反对从“左”的和右的方面来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

（一）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都不可能是生而知之，而只能是学而知之。既然是学而知之，那么，他的成长和发展，他的世界观的形成，都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经历了一个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们并不是天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而是从青年黑格尔派，到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尔后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同志也不例外，他的世界观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也有自己早期哲学的阶段。

正如周恩来同志于1949年5月7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过神拜过佛。毛泽东同志很反对人们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泽东同志生长在十九世纪末（1893年）封建社会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正因为如此，在毛泽东的早期哲学思想里，无疑是会包含一些封建主义、唯心主义的成份的。任何一个人，包括某些伟大的思想家，都不可能生存于真空之中，他们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有血有肉有感觉有思想的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思想也必然要打上一定历史时代的烙印。因此，考察毛泽东的早期哲学思想，就不能忽视她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六十多年以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人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必然会有

反抗；哪里有反动的野蛮统治和血腥镇压，哪里就必然要爆发革命。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劳动群众，被逼的走投无路，这种濒于绝境的情况迫使中国人民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即1913——1918年，正值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变化的时期。当时，在国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结束了几千年以来的皇帝制度，推翻了宣统这个清朝末代皇帝，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没有落在中国人民的手里，却被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了，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种种方案来改造中国的设想破产了。中华民族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究竟“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地要求人们作出决择。一些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在顽强地探索着中国的出路问题。一种改造中国的方案行不通，必然会接着提出第二种、第三种方案。对辛亥革命的希望转化成为失望，失望转化为愤怒，愤怒又转化为革命力量。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正处于这种革命风暴急骤、黑暗向光明转化的前夕。

这种动荡、分裂和改组的政治局面，也同样存在于国际的环境之中。在国际上，1914——1918年，发生了空前规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搏斗，各自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状态，根本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乘虚而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帝国主义的走狗、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实现做皇帝的美梦，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利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从政治上野蛮的镇压和打击革命势力，妄图把一切革命党人斩尽杀绝，并采取愚民政策，制造舆论，蒙蔽和欺骗人民；在思想上，他大肆鼓吹封建的复古主义，竭力推

行尊孔读经。而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保皇派，也组织了“孔教会”等麻醉和欺骗人民的反动组织，并厚颜无耻地公开向袁世凯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一时间，尊孔复古和迷信鬼神的乌云，笼罩着神州大地的上空，弥漫于中国文化思想界。国家一天比一天恶化下去，“物极”已经到了“必反”的时候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

这时，1915年9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出版了。尽管这个刊物在当时发行量并不大，但它却揭开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吹起了启蒙运动的号角。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旧的封建传统发起猛烈的冲击，标志着亚洲的“睡狮”已经开始苏醒了，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了。

在这个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的胜利进军途中，世界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资本主义统治几百年的旧世界敲响了丧钟，而且打开了一个无法弥补的“缺口”。这个炮声震撼了世界，也震醒了中国人民，给正在不知走向何处去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一道曙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考虑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和处理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却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即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究竟哪条道路能够救中国，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都必须做出选择。

这些国际国内的重大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事件，不能不在中国青年中发生深刻的反响，也不能不在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上和政治立场上，打上深刻的烙印。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9页。

毛泽东同志于1913年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但他早于1911年，就已经来到长沙。他临去长沙前，给他表兄文鉴泉和文运昌抄了一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出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此表自己立志求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当时，长沙是革命党剧烈活动的地方，社会上充满着新气象。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是全国第一个响应独立的省份。当革命党人和新军正在长沙起义时，他就想去武昌参加革命军，因为交通不便，没有去成。但他耳闻目睹，不少骇人听闻的杀害革命党人的暴行，使他感到万分痛心和震惊。辛亥革命虽然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并没有改变封建制度，但它的失败，却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它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中国到底走向何处去？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拯救中国？这是青年毛泽东反复探索的问题。他退出新军后，过了一段自学生活，利用空闲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了严复等人翻译的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他自学了外国史地，希腊、罗马等文艺作品，使他最受启发的是《物种原始》、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密尔的《伦理学》、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天演论》中所阐述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规律，同中国的“今不如昔”的传统观念，是针锋相对的。实际上，它起了向全国人民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的作用。所以，当时被称为“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邪书”。此书并不完全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原著，它经过严复的翻译，夹叙夹议，引古论今，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它等于是严复同赫胥黎合著的。书中有针对性地批判了禁锢人们思想的孔孟儒家和宋明理学。以“理”为中心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认为“理”是绝对不变的世界万物的基础，理主要是指封建社会中的三纲五常的“君臣父子之理”，它是

永恒的、唯心的道德规范。而影响更深的陆九渊王守仁一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则认为“心即理也”，“理”即“仁义理智”等封建道德。千百年来，这种观念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天演论》打破了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束缚，蔑视传统观念，提倡斗争、自强、自力、自主的世界观，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给人们带来一种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个人的新的观点和态度。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反对旧文化、旧礼教和旧的道德传统，提倡新文化和新的道德，就必须有一种新的世界观作指导；因为如果仅仅是对旧文化和旧道德深恶痛绝，而没有新的世界观来填补这个“真空”，那么，旧文化和旧道德是反不掉的。封建传统的再生机能是十分顽强的，它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闭关锁国的旧中国，几乎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国外文化的传播，受到重重阻碍。稍有一点新思想，都被视为“离经叛道”，轻则斥为“大逆不道”，重则身首异处。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震撼世界的“幽灵”游荡的时候，一切剥削阶级都处于胆战心惊之际，而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几乎落后了一个时代。人们只能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库中寻找批判旧文化和旧道德的武器。反动统治阶级尽管采取愚民政策，但是西方的各种时髦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和尼采哲学等等，都渗透进来，一时都成为新思想并被传播。同这些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相比，机械唯物论和进化论，已经很进步了。当时的先进分子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他们在提倡新文化和新道德，批判孔孟之道时，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然而，他们的思想武器，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机械唯物论和进化论。1916年，陈独秀发表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就是在进化论思想指导下写的。他写道：

“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史例具在，不可谓诬。…一种学

说，一种生活状态，用之既久，其精力低行至于水平，非举其机械改善更新之，未有不失其效力也。此‘道与世更’之原理，非稽之古今中外而莫能破者乎？”1917年2月，李大钊发表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也反映了他的机械唯物论观点。他说：“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进化。道德者，宇宙现象之一也。故其发生进化亦必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而其自然变迁，断非神秘主宰之惠与物。亦非古皆圣哲之遗留品也。”这些机械论和进化论观点，虽然比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是落后的，但比起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无疑是先进的。这种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大量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它反映了“五四”前夕，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阶级旧文化之间的斗争。当时一些革新运动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做了大量的启蒙工作。这就是所谓“新学”运动。这种“新学”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意义，是替旧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但这是通向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经之路，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对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

的。”^①毛泽东的早期哲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二）毛泽东的“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二元论哲学思想

毛泽东在1917年的《〈伦理学原理〉批语》之前，他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他在1914年听“修身”和“国文”课时记的笔记中写道：“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程学读书之法见事先下判断，继看下文”。“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人心即天命”等等，都是过分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作用。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也流露出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王阳明有句名言：“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毛泽东写道：“我即宇宙”，“宇宙间事物之活动，事物自我活动而已。吾以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②表现了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也有另一方面，即同时集中地体现了二元论的哲学思想。毛泽东主张，“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即不灭何生乎？”^③就是说，精神和物质都具有同等地位，都是本原，这既不同于彻底的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彻底的唯心主义，而是折衷于二者之间，所以是二元论。

毛泽东这种从“我即宇宙”的一个精神本原到“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两个本原，这在他的哲学思想上，是一个进步，是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8—1359页。

②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5期。

③ 同上。

向唯物主义靠近了一步。“精神不灭”固然是唯心主义的命题，但他又提出“物质不灭”的唯物主义的命题，这种自相矛盾的哲学论点，正是康德的二元论哲学的基本特征。从主观唯心论到二元论，距离从二元论到唯物论，已经只有一线之差了。

毛泽东提出“物质不灭”的命题，并不是偶然的。第一，他受了王夫之等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的影响，也受了西方机械唯物论和进化论思想的影响；第二，他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在《讲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他重视实际，1917年4月1日，他在《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已经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他试图从物质第一性和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来阐述体育的意义，即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育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①这就是说，德和智等属于精神或意识的范畴。体则属于物质范畴。德和智依赖于体，体是第一性的，也即物质是第一性的，德和智是第二性的，也即意识是第二性的，后者是由前者所决定的。

从上述可知，毛泽东从主观唯心主义到康德的“本体论”，又把“本体论”解释为一种不死的“心灵”，所以，他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他在主张“精神不死”的同时，又主张“物质不灭”的唯物主义命题，这当然是二元论的思想。然而，他又明确地提出“心灵本之自然”，认为“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②这就又把“实体”和“自然”

① 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5期。

② 同上。

等同起来，对实体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虽然他没有摆脱二元论的观点。他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脱离“精神不死”的唯心主义观点，逐渐向“物质不灭”的唯物主义方向靠近。

（三）毛泽东早期的辩证法思想

一般说来，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在他投身于革命之前，他往往要探索这个世界是发展变化的，还是凝固不变、停滞不前的；如果是发展变化的，那它又为什么会发展变化，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它的发展变化？凡此种种，都要在探索的过程中弄清究竟，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改造社会的战略部署。青年毛泽东也是这样。为了探索这些问题并找出答案，他看了不少中外名著，从中国古代的先秦诸子，到王夫之、谭嗣同、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西方的亚当·斯密、赫胥黎、康德和泡尔生等人的著作，他都进行了研究和比较，又对社会进行了调查，已经初步地学会辩证地思考问题。

青年毛泽东除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外，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也给了他很大影响。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认为，宇宙间事物存在着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例如阴阳、刚柔、强弱、兴废等等，都是互相依存和互相联结的。《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论断，深刻地说明了矛盾双方之间的对立、依存和转化的关系。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青年毛泽东受到许多启迪。而风行一时的康梁思想，更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有为发挥了《周易》中的“变易之义”，他说：“盖变者天道也，……天以善变而能久……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他认为，变革不但是“天道”的基本内容，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据此，他提出了“公羊三世”的进化史观和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尖锐地批判了顽固派所坚持的“天不变，